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第 26 辑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主办

文化遺產與
文化認同



四川人民出版社

文化遺產與
文化認同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第 26 辑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主办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克坚
责任校对:欧风偃
封面设计:原谋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文化与文论. 26 / 曹顺庆主编. —成都: 四川
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614-7772-4

I. ①中… II. ①曹… III. ①文化研究—世界—文集
②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G112-53②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5189 号

书名 中外文化与文论(26)
ZHONGWAI WENHUA YU WENLUN(26)

主 编	曹顺庆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7772-4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65 mm×240 mm
印 张	12.5
字 数	23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 <http://www.scup.cn>

前言

2013年11月23—24日，在中华多民族文化遗产与文化凝聚协同创新中心的支持下，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主办“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国际研讨会，邀请了30余名国内外学者前来切磋讨论。期间既产生了不少真知灼见，又发现了很多新的问题。

本辑“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专号收录的17篇论文，是这次会议的总结和延伸。论文作者的学科背景包括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学等领域，属地则来自西班牙和中国的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专辑开篇以夹叙夹议方式对会议作了概述，接下来的议题分为几方面展开。

“历史与认同”一栏，收录了叶舒宪与张洪友、史芸芸的2篇论文，探讨了中国古代和近代的认同问题。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来的族群和文化的多样性，是我国的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何认清和继承这一遗产，需要大家继续探讨。

在“遗产认同理论”一栏，杨煦生和匡宇对identity的脉络进行了知识考古，又分别从比较文化学和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这一概念与中国国家认同的关系。邱硕讨论了人类学诗学视角下的认同问题。李菲对“身体”这一概念在中西方语境里的梳理，提示了文化遗产研究的出发点。

“遗产认同个案”栏目提供了各式各样的遗产研究和认同研究案例。其中既有讨论某一民族文化遗产与认同的案例，又有探讨国家文化认同表述的论文。前者如李小凤的明清江南回族家族的文化遗产、银浩的仡佬族女神崇拜；后者如梁昭的“母语文学”与认同观念和杨骊的“鹿崇拜”案例，都各有见解，值得关注。

最后的“跨文化研究与域外比较”，包括了文学、人类学、电影学的研究案例，既有学理研究，也有中外案例讨论。一如本论文集以往强调的比较文学及跨文明视野，杜萍与曹顺庆的“变异学”研究、张婷和秦岭的“和而不同”学理基础、冯欣的后殖民境况下的

“自我表述”阐述，皆提供了意在互补和对话的理论视角。王苑媛、赵渭绒和戴珂、西班牙学者泽维尔，分别讨论了中国、英国和东南亚等不同时空、不同文本类型体现的多种认同案例。

遗产与认同，在当代既是时政，也是学术；既是中国的热点，更是世界议题。这要求学者们一方面要重新整合知识和理论，另方面还需密切关注变动不居的现实。本辑的编纂，是当代学术发展的一个侧面，希望能为未来的筹划留下回声。

梁 昭

2014 年 4 月

目 录

- 1 文化遗产研究的新起点
——简述“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国际研讨会 李国太

历史与认同

- 9 玉石之路与华夏认同 叶舒宪 张洪友
21 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的历史演变 史芸芸

遗产认同理论

- 36 “Identity”的多元意涵及其在当前中国语境中的意义 杨煦生
44 忒修斯之船的疑难
——同一性、承认与现代国家的集体认同 匡宇
61 身体：一个遗产关键词的东西方对话 李菲
75 在文本与文化之间
——民族志写作与文化认同的关联 邱硕

遗产认同个案

- 87 从“母语文学”看少数权利和文化认同 梁昭
100 民族身份遗产与多元文化交融
——泰州回族俞氏家族的个案考述 李小凤
109 文化认同表征的普遍性与多元性
——以鹿崇拜为例的考察 杨骊
120 仫佬族白马娘娘崇拜与族群认同 银浩

跨文化研究与域外比较

- 132 论“跨文化”背景下的变异学研究 杜 萍 曹顺庆
- 141 “少数电影”与认同政治
——以阿比察邦·韦拉斯哈古的电影为例 王苑媛
- 153 毛姆的中国书写：论毛姆《面纱》中的中国人形象 赵渭绒 戴 珂
- 161 从沉默的“他者”走向自由的自我表述
——萨义德《东方学》与比较文学的交锋 冯 欣
- 170 作为比较文学学理基础和身份标识的“和而不同”
张 婷 秦 岭
- 179 On the Role of Food Habi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Identity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Spain〕 泽维尔 (Xavier Romero-Frias)

文化遗产研究的新起点

——简述“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国际研讨会

李国太

[摘要] 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在多元文化主义时代备受关注，但从学理到实践仍存在诸多尚待厘清的问题。2013年11月23—24日，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主办了“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国际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30余位学者围绕“identity”与“认同”的语用差异、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的理论与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经验与海外案例、西方世界的中国文化遗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关键词] 文化遗产 文化认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 海外民族志

引言

在多元文化主义时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间的张力逐渐凸显^①，被视为认同基础的文化遗产，也在学术讨论之外引起联合国相关部门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②。但被视为“遗产”的民族文化如何既能唤起本民族的“文化自觉”，又能强化“国家认同”和推动全人类共同进步？相关讨论刚刚展开。

四川大学于2005年成立了“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主办了《文化遗产研究》集刊，长期致力于文化遗产研

① 近年来关于此问题讨论颇多，参见袁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82年于墨西哥召开了“世界文化政策大会”，1998年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政府间文化政策促进发展大会”，提出“当文化被理解为发展的基础时，文化政策这一概念本身需要很大程度的扩宽”。见<http://www.docin.com/p-724530083.html>。时隔15年，以“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主题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会议于2013年5月15—17日在中国杭州举行，会议发表《杭州宣言》，更加突出文化多元时代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以及从“文明冲突”到“文化对话”的紧迫性。见<http://www.cbcsd.org.cn/jlyhz/20130622/58187.shtml>。

究。同时,以徐新建教授为首席专家的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也将多民族文学和文化遗产视为研究的题中之义。^①2013年,四川大学阿来教授和赵毅衡教授分别以“甘青川藏族口传文化汇典”和“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为题,中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为进一步推进文化遗产和文化认同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此背景下,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于2013年11月23日、24日举办了“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国际会议。^②来自西班牙、法国、泰国和来自北京、上海、成都、昆明、内蒙古、厦门等地的国内外一流专家学者共3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者的学科背景涉及人类学、民族学、符号学、历史学、建筑学等诸多领域。

此次会议设置了“文化交流与遗产认同”、“遗产传承与身份认同”、“本土传统与遗产认同”以及“遗产实践:保护与发展”四个议题。“会议宗旨”提出:

(会议将)从多学科和跨国界角度组织讨论,希望通过与会者各自的视角、案例及关怀进行阐述和对话,不求千篇一律,但求不同而合。^③

在延续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会议发起者徐新建教授明确表示不仅要分别讨论“文化遗产”和“文化认同”,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使主题得到更深层次的拓展。同时,会议宗旨所强调的“不求千篇一律,但求不同而合”,也为讨论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理论交锋:“identity”还是“认同”?

11月23日上午,四川大学冯宪光教授的发言《中华多民族文化的“一体多元”结构》拉开了此次会议的序幕。冯教授首先区分了“中华民族文化”

① 2004年四川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办了首届“多民族文学论坛”,到2013年为止,论坛已经连续举办10届,都致力于“突破既有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囿于学科的界限,用跨学科的方法对民族文学进行研究,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出发,重新打造一种符合少数民族文学时代发展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参见明江:《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 继往开来的十年之路》,《文艺报》,2013年11月13日第5版。论坛曾提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等原创性的学术观点。有关中国多民族文学遗产与多民族文化认同的关系,论坛也已展开了数次讨论。

② 在此之前,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和暨南大学文学院已经先后组织了“中国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十年历程”和“转型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两次大型学术会议。此信息由徐新建教授为笔者提供,特致谢意。

③ 参见“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国际研讨会”会议议程。

与“中华多民族文化”两个概念的内在差异，从而认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结构”主要是政治的一体而非文化的一体，中华多民族文化本身则呈现出“多体一元”的格局。北京大学杨煦生教授则从“identity”这一被汉语世界普遍译为“认同”的词汇入手，探讨了其本身具有的多元意涵及其当前在中国思想语境中的特殊意义。进而指出“identity”在西方语境中关涉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宗教等诸多领域，因此在翻译和具体的使用中应移步随形。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作了《中华多民族文化认同的三大困境》的发言，指出中华多民族文化认同面临着“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不认同”、“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互不认同”、“海峡两岸的互不认同”的困境。

本场讨论关涉“文化认同”的根本性问题，冯教授和曹教授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中华多民族文化认同的内在特点，而杨教授则从“认同”在不同语境转换中的差异性表达提出重新认识目前国内的认同热问题，引起了评议人高丙中教授和与会学者的激烈讨论。高教授对中华多民族文化“多体一元”的设想提出异议，认为费孝通先生的“一体多元”不仅是政治上的一体，也涵括了文化的多元。北京大学蔡华教授则从杨教授的发言引出对会议名称“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之“认同”词性的质疑。他说从三个发言中明显感觉“认同”作为动词而被使用，但是“identity”在人类学的话语中更应该是名词“身份”的对译，因此“文化认同”可能更多包含“文化身份”的内在含义，两者不能混淆。上海交通大学叶舒宪教授则从“identity”被比较文学界接受的历史入手，就曹教授的三大困境提出质疑。曹教授从两个方面作了回应：第一，文化遗产存在认同困境并不排除认同的存在；第二，汉语世界中一直存在“认同”，如果非要强调英语世界中的“identity”与汉语世界中词汇的对译，则是“失语症”的表现。

在笔者看来，“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可以并置，它们与“文化遗产”的内在关系并不会因二者的差异而割裂。可以说“文化遗产”能使其主体——文化承载者明确在诸多文化类型中的自我身份，从而在行动上获得对某种遗产的认同，并进一步强化自我的身份意识，亦即通过“文化遗产”唤起“文化自觉”，从而实现“文化认同”以强化“文化身份”，再反过来使“文化遗产”得到保护。

个案呈现：从“理论”到“实践”

学理上的探索必须回归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具体个案研究中验证理论甚至进一步推动理论向前发展。因此，本次会议除宏观的理论探讨外，也有发

言对特定地区、特定族群、特定时代进行个案分析,从个案中透视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的内在关联性。西班牙学者泽维尔(Xavier Romero-Frias)以南亚和东南亚为考察区域,探讨了饮食习惯在族群的身份认同中所扮演的角色。法国学者步睿飞是建筑设计专家,长期关注中国古建筑、古街道、古村落的保护,在本次会议上他以自己在北京、河北等地的项目为例,从地理空间上提出现代城市建设的“三区”概念,即核心城区、城郊和郊外。他认为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城郊和郊外往往以核心城区为建设的目标和模仿的对象,致使“本地人”的文化自豪感逐渐丧失,在文化认同上无所适从。因此,城市建设和规划必须利用城郊和郊外本身的文化遗产,回到当地人的视角,在建设中寻求文化认同。

蔡华教授以中国的纳人为例,认为文化遗产等同于文化身份,二者是同构的,一旦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消失,其文化身份也随之变化。中央民族大学钟进文教授以青海托茂人为例,探讨了藏边社会族群作为两种知识体系的复合体,虽继承了本族群的文化遗产,却不断遭遇到新的身份认同的尴尬。^① 四川大学李祥林教授以四川茂县的中国羌城为例,结合羌族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认为汶川地震后,羌族在文化认同上同时涵括了先祖认同、国家认同与文明认同三个维度。三峡大学吴正彪教授以近年来在贵州发现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为例^②,指出文化遗产不仅能强化族群的文化认同,也是族群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识。

以上发言均从个案入手,探讨了在当代语境下文化遗产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本地人如何重新认识自身的文化传统,以及由此造成的在文化认同上的不同选择。

非遗专题:从“国际体系”到“中国智慧”

近年来,中国掀起了一场政府主导、学者参与、社会协作、全民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一大批植根于乡间的活态文化被界定为“遗产”

① “藏边社会”是近年来提出的新概念。所谓“藏边”,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西藏自治区以外的甘青川滇四省的藏族地区,虽然都是藏族地区,但是和西藏自治区有一些不同的社会课题;二是青藏高原东北面和东南面的边缘地区,还有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因为涉及外交和国界问题,此处也就未包含这一地区。”参见陈庆英:《关于“藏边社会”的思考》,《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24卷第1期。由于“藏边社会”族群和文化的多样性,此区域内人群的自我认同与其历史遗产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

② 《亚鲁王》被大多数学者视为苗族的英雄史诗,但也有学者认为“英雄史诗”的定性会遮蔽其本身的丰富含义。参见徐新建:《生死两界“送魂歌”——“亚鲁王”研究的几个问题(未刊稿)》。

而纳入保护范畴。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这次会议讨论的热点,高丙中、徐新建、彭兆荣等学者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作了论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意义率先引起讨论。高丙中教授在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国国家建设》的发言中认为,目前学术界低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提法的意义,提出应该将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放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整体语境中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法使社会的文化成为有法定地位的、不可改变的公共文化,从而有别于近代以来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文化革命”,因此是有未来的。^①针对高丙中教授的观点,徐新建教授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首先在分类上自相矛盾,进而他认为当代中国的“遗产问题”实际上体现出一种价值取向上的内在调整^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对于各自有别的文化认同而言,文化遗产如何发挥作用;第二,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方面,文化认同的功能是什么;第三,在多民族国家和多元化世界里,如何看待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的区分与联系。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可谓轰轰烈烈,但热闹的背后是否存在危机?如果存在,危机的根源又何在?彭兆荣教授的发言正是对此问题的回答。他从中国古代有关“本草”的文献记载入手,围绕“本草名实”、“本草体性”和“本草博物”三个方面展开讨论,认为本草属于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类型,具有中国式的“名实方式”、“体性结构”,是中国传统的认知、经验、知识、表述和技艺的集合体,属于中国式的博物学传统。彭教授力图以“本草”案例说明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重要性与可能性,延续了他近年来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这场运动的思考。^③李菲博士则提出“身体面向”的概念,指出在非西方世界,知识或许并不是认知的,而是要体知、习得和践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体传承不仅是“习得”和“活用”某种知识、技能,更关系到文化中的成员如何“成为其所是”的社会化建构与认同,从而揭示出

① 与此观点相近的表述还见于高丙中的《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革命的终结》,在那篇文章中他详细论证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为近代以来在文化认同上长期自我扭曲的文化古国提供了文化自觉的方式,为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公共文化的框架”。参见高丙中:《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革命的终结》,《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② 这种价值取向上的内在调整,在徐教授《当代中国的遗产问题》中被表述为“从‘革命’到‘守成’的世纪转变”。参见徐新建:《当代中国的遗产问题》,《文化遗产研究》(第一辑),巴蜀书社,2011年,第5~19页。

③ 近年来,彭兆荣围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先后发表《物·非物·物非·格物——作为文化遗产的物质研究》(《文化遗产》,2013年第2期)、《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探索》(《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等文,均旨在探讨基于本土文化特征建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可能性。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与“身体面向”相关的“身、体、践、行、习”等本土经验，探讨在西方遗产话语之外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纳日碧力戈教授虽不着眼于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体系，但却呼吁要重视民族文化的本土传统，从本土传统中寻找人类未来的发展路径。他将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引入人类学，认为文化遗产是活态的，关键在于如何用族群自身的话语表达其具体的所指。他通过“天地通”的案例，区别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即建立在“类索绪尔式”思维之上的实践理性和讲究“形物与神韵相勾连”的整体性思维。前者将人神相对立，造成一系列世界性问题，回归后者或许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模式。^①

汤晓青研究员选取了湖北“新民歌”、“雁将班”、“龙船调”三个案例，指出地方文化精英在“非遗”的文化语境中，日趋成为保护文化的特殊角色，对地方文化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上述理论的探讨作了很好的补充。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但由于国情的差异，每个国家的态度和采取的具体措施各异，而这些国外的经验无疑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讨论提供了比较的对象。彭文斌教授的《加拿大原住民的文化展示与认同》正是一个海外世界如何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它与文化认同内在关系的案例。他认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述并不一致，博物馆式的文化遗产保护更多关注展示序列，很少提及遗产的拥有者到底是谁，文化遗产到底属于原住民还是属于国家这样的问题，因此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会剥夺原住民的认同感和历史感，进而有平面化倾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法在加拿大等国备受质疑。

其他议题

近年来，部分中国学者倡导将西方国家作为人类学的“异域”进行研究，

^① 关于两种思维的讨论，季羨林、张光直、乔健等人已有论述。季羨林认为东方思维重综合而西方思维重分析，这种巨大的差异，使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存在本质不同。过去两百余年，西方文明为人类物质文化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相应带来了诸多问题，而东方文明或许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方向。参见季羨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华艺出版社，2008年。张光直认为中国文明形态是连续的，而西方文明形态则是破裂性的，中国的文明形态“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参见张光直：《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考古学专题六讲》，三联书店，2010年。乔健在《美洲与亚洲文化的远古关联》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参见乔健：《印第安人的颂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海外民族志”也因此成为中国人类学界的一个热门词汇^①，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接受自然成为海外民族志考察的对象。来自云南中医药大学、有着20年法国生活经验的贺震教授作了关于针灸在法国传播的发言，他认为针灸经过“法国化”后，其形态已经“过中国化”，在实际的操作中有浓缩、夸张甚至创造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趋势，反映的是西方居民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资源对针灸这一舶来品的解读和重塑。贺教授进而指出，“过中国化”的针灸其实是西方文化的产品，应该如何面对西方社会数量众多的“过中国化”的“中国文化遗产”，或许人类学能够提供新的视角。

如果说以上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当代社会的文化遗产与认同问题，那么叶舒宪教授的发言则将与与会者带回到华夏文明的初期。他认为早在秦统一六国之前，玉石就已经维系着东亚大陆内在的文化认同，他用考古、文献和口头传统相互印证的方法拟构出一条横贯亚洲大陆的玉石之路，进而指出玉石是华夏文明构成的一种实质性的文化认同要素。

除大会发言以外，还有一些学者提交了学术论文，如阿库乌雾《彝族史诗〈勒俄〉生态美学智慧解析——以“雪子十二支”为例》、齐木德道尔吉《草原文化的传承与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刘壮《地缘认同与中原想象——重庆苗疆边缘族群的族源表述》、王良范《族群叙事中的身份认同与建构——反排苗族木鼓舞的人类学解读》，力图寻找族群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智慧，以及在当下传承和发展中与族群认同的内在关联。黄萍《传统与现代的博弈：旅游扶贫下民族村寨文化遗产遭遇失忆冲击》、谭宏《文化生态变迁中文化偏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影响研究——以中国为例的实证报告》、王亚娟《文化遗产与认同下的旅游发展机会》则从旅游开发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遗产的处境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文化认同变化。

最后，徐新建教授总结了三点：第一，讨论中所呈现出的观点上的分歧恰好证明认知方式和表述系统的多样性，因此并不代表会议的不成功；第二，遗产是在认同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认同问题大于遗产问题，因此通过文化遗产实现文化认同应该是本次会议的总体框架；第三，已经展开的一系列有关遗产的讨论本身具有互文性，因此可以将这些会议放在整体的框架内做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综述，这必将促进学术的不断前进。

① 相关著作可参见刘朝晖：《海外民族志的田野调查与文本表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1卷第5期；高丙中：《海外民族志：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路途》，《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王建民：《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学术史》，《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结 语

整体而言，本次会议在参会人员的学科背景、会议议程的创造性设计以及讨论议题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上，都很好地体现出会议的宗旨。11月24日下午6时国际会议闭幕，但会议的主题以及延伸出的相关问题的讨论并没有结束。11月25日挂牌的四川大学“2011计划”——“中华多民族文化遗产与文化凝聚”协同创新中心，无疑将为探讨多民族中国的文化遗产提供新的平台，也充分证明与遗产相关的认同问题已被视为“国家急需”的重大问题，关涉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关系到文化的过去、现在以及全人类的未来。

作者简介：

李国太，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化遗产与人类学研究。

历史与认同

玉石之路与华夏认同

叶舒宪 张洪友

[摘要] 玉教即玉石通神的神话信仰，它作为华夏文明发生期的观念要素，比秦始皇的金戈铁马要早两千年，在青铜器萌芽之际，已经充分驱动史前社会中的玉礼器生产和使用，并且像异地传教那样缓慢地在东亚大陆传播，在约四千年前完成除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以外的较全面覆盖。新疆昆仑山和田玉的持久性东输，形成了华夏文明特有的资源依赖和自古及今未曾中断的玉石之路，铸就了本土传统的核心价值理念（以玉为最高价值），奠定了汉语文化的原型符号。

[关键词] 玉教 玉石神话 玉石之路 华夏文明

一、华夏文明形成之奥秘的新认识

关于世界文明古国，流行已久的说法是四大文明说，即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20 世纪的考古学发现，在四大文明古国说之上，又增添了一个更古老的文明——苏美尔^①。苏美尔城邦在巴比伦文明崛起之际已经遭遇灭亡的厄运，以至于苏美尔人种失传于后世，只有他们发明的楔形文字被后来入侵的统治者阿卡德人和巴比伦人继承下来。五大文明中除了印度和中国，都在历时上中断了，没能将其古老的辉煌活态地继承和延续下来。印度文明则在近代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就剩下一个华夏文明，至今还在人种和文化方面传承着其古老的数千年传统。如此看来，探讨华夏文明的奥秘，应该是

^① 从考古学视角看苏美尔文明，可参看英国学者哈里特·克劳福德的《神秘的苏美尔人》一书，张文立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还有国内学者拱玉书的《西亚考古学》，文物出版社，2007 年。

非常诱人的课题。美国汉学家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①一书的书名就很能说明问题。研究文明史的西方学者，为什么要到中国来重新“发现历史”呢？对照人类学家沃尔夫的后殖民主义名著《欧洲与没有历史的民族》，答案就是现成的：欧洲中心主义支配下的世界历史观原本就无视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甚至以为他们没有进入世界历史的资格。后现代和后殖民的新史学彻底扭转了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开启史学研究新纪元。为“没有历史的民族”修史，甚至为无文字民族修史，成为当今一大潮流。为探求人类最早的近东文明的由来，当今的前沿学者已经把跨学科研究的眼光聚焦到9000年前的土耳其史前聚落遗址^②，而拥有“二十五史”官修史书传统的中国，情况又如何呢？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第四章题为《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除了精锐批判美国史家思想的帝国主义偏见外，还特意提示如下的悖论：

局外人永远无法形成真正的内部观点。由美国人采用中国中心取向来研究中国史，这一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③

回应这一悖论，我们同样可以发问：难道只有局内人才能找到本国历史的真相吗？作为局内人的中国人，数千年来为什么没有提出多少关于自己古老文明史的洞见呢？看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选择局外或局内的视角，而是需要一种能够超越此种二元对立的认识困境的全球史新视野。换言之，需要有人类文明史知识背景的中国史研究者，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人类文明史知识是由单个文明史构成的，有关中华文明形成的新知识，其意义非同小可。

本文尝试性地解释华夏文明的构成的某种特殊支配性因素，从而揭示这个文明的一大奥秘。要想达到这一理论目标，当然最好能够先找出一种实质性的文化认同要素，即能够早在数千年前以前，在数百万平方公里大地上，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风俗的广大人群统和到一个统一的行政体中的奥秘。初步探索的结论是以往的研究前辈们始料不及的：比秦始皇的金戈铁马要早2000年，在青铜器生产刚刚萌芽，还没有在各地普及开来

①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

② 较新的代表性成果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霍德尔主编的新书《文明萌生期的宗教：以卡托胡玉克为个案》。Ian Hodder, *Religion in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 Catalhöyük as Case Stud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③ Ian Hodder, *Religion in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 Catalhöyük as Case Stud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75.